

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的困境与前景

张 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族志写作研究出现表述危机,进入反思时代。基于此背景,从民族志写作目的、对象、内容及如何书写四方面梳理西方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研究,分析其中困境,旨在为中国民族志写作实践和研究前景提供启示。提出应把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文本作为探索本土文化书写范式的资源,挖掘本土民族志书写范式,跳出西方民族志写作藩篱,立足当下共时性田野,结合历时的文字历史,接续历史文化传统。

关键词: 民族志写作;文化书写;历史;传统

中图分类号: K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6)04-0277-07

Literature review on ethnographic writing after *Writing Culture*

ZHANG C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in four aspects: First is on the aim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second is on what kind of audience the ethnography is targeted; third is on the content of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forth is on the strategie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All these are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China. The paper argues that based upon the ethnographic fieldwork the indigenous ethnographic writing should take its long history of the past (such as the local gazetteer, historic records, etc.) into considerat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Keywords: ethnographic writing; writing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以下简称《写文化》)为代表的“反思人类学”的兴起,暴露出美国的民族志学者曾持有的偏见和预设。反思的实质是研究者对自身写作的反思,对民族志写作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关系及对忽视写作对象的反思。民族志的科学性、作者的权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质疑,比如,后现代民族志首先要与科学划清界限,否定以往民族志写作中的科学

收稿日期: 2015-09-07

作者简介: 张 崇(1980—),女,辽宁省辽中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思维;民族志写作是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建构,即承认写作者的自主性和植入写作中的价值观;民族志所采集到的材料是碎片化的,不可能是客观事实的记录;民族志写作具有道德性;民族志写作必须要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性和道德判断等。

民族志写作,又称为文化写作,是表征他者所处社会现实的特殊实践,这种表征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经历和研究者在具体田野的语境上的分析^[2]。作为质性研究,民族志写作是对写作对象和文化进行阐释的过程,因此民族志写作具有主观性,同时也是民族志作者自我反省的过程,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民族志会促使其在认知世界和人性等方面发生变化^[3]。由此,民族志写作一是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二是为作者和读者自身认识的提高。本文从为什么要写民族志、民族志为谁而写、民族志写什么和如何书写民族志四方面梳理了反思时代的民族志书写研究,通过梳理《写文化》以来的民族志书写研究来分析这些问题,旨在为当下国内民族志写作实践和研究提供启示。

1 为什么要写民族志

民族志作品不是站在西方视角看非西方世界,而是双方相互学习和了解的场域,这样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才可能发生,实现和平的交流沟通方式^[4-5]。民族志作品就是介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第三空间^[6-7]。民族志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沟通而不是为了描述世界。因此,今天的民族志是翻译不同的文化系统、价值观和信仰,以便互相了解和沟通^[8-9]。通过各种写作实验寻找方法、媒介、模式,将民族志话语本身融合进入人类学田野工作,民族志写作作为一种探寻过程^[10],是对自我的追问,叙述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是为了理清事件对于叙述者的文化意义,与作者过去的体验和生命产生联结,进而产生自我认同^[11]。因此,民族志作为表征他者文化的方式,对于民族志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方式^[12]。

所有文化都由话语建构,因此,写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13-16]。民族志写作作为一种话语,在叙述中渗透着批判^[17-18]。Marcus 等^[19]提出要把人类学的批判功能重新恢复起来。民族志写作应在形式上更具有话语思维的批判视角,这并不是反对理论或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而是对已建立的理论视角、论点或批评更加开放和敏感。民族志写作最终要参与社会实践,希望能够通过写作对社会现实反思和批判,使社会实践向积极的方向转型和改变^[20]。

2 民族志为谁而写

民族志写作是否可以既满足专业标准,也能让大众接受?民族志写作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阐释过程,也需给读者留出阐释空间。因此,人类学写作面向的读者群不应仅仅是学者圈子内部的交流;更要面向宽泛的受众^[21]。现在的民族志写作应跳出学科框架的束缚,走入更加广阔的跨学科视野,人类学应该与历史学、新闻学、电影制作等学科相结合,表征这个人人有份的人类世界,其目标受众群也应多样化^[5]。Childress^[22]探索既符合专业要求,也能够为更多受众所接受的写作方式,认为面对不同读者群可能所要求的写作也不同,对于专业人士,可能要求专业;对于大众,可能是可读性更强。这就涉及民族志怎么写的问题,比如运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改变叙述方式,可以让科学更加人性化和让人乐于接受而又不违背科学的本质,并拥有更加宽泛的受众。讲故事会让人身临其境并且获得愉悦之感^[23]。

3 民族志写什么

传统的民族志写作被称为科学性写作或现实主义写作^[24],其中民族志作者的身份和自我是被忽视、弱化、隐匿的,但是在实验性民族志中,民族志写作者的身份可以彰显,突出的是人性、作者的生活经历影响其写作的视角^[25]。在实验性的民族志写作中,作者在面对他者及他者文化时,对于自身和自身文化也在不断反思,最终是对人性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对象的“人”,还包括民族志作者自身作为“人”的存在。民族志写作在于是否可以引发对人性、人本身的思考^[26]。作者不是全知全能的角色,而是通过写作向读

者展示人性的一面。

在具体民族志实践中,人类学家自身如何成为民族志研究的资源?民族志作者的体验如何融汇到写作中?能否把分析性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和阐释性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融合到同一民族志作品中?这是很多民族志研究者面临的研究课题^[27],其中自我民族志或自传式民族志成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研究的一个焦点^[28]。

自我民族志不像传统的民族志那样,拒绝民族志研究者的主观性、情感情绪及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对研究本身的影响,好像这些根本都不存在一样。自我民族志可以用文学性和启发性的手法,向读者展示^[29],把读者带到某个场景,展示场景中人物的想法、情感和行动,让读者体验场景中人物的经历^[30]。鉴于不同的故事,民族志作者选择不同的人称叙述方式,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二人称,有时则是第三人称,非常灵活。同时,由于不同研究者言说方式、写作方式、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及信仰等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人类学者个人的经历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其写作呈现,从这种角度来说,民族志写作文本也是作者的传记。民族志写作是作者对于自我的一种追寻,作者的个人经历、情感等渗透其中,是对个人身份的追求。因此,民族志叙事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之间具有很重要的关联^[31]。

民族志写作叙述语言对描述对象的塑造作用,能够激发道德上的体验,引发读者的道德感、责任感及对人生的感悟。民族志写作不仅提供知识,也提供通过语言表征引发的感官体验。在这样的写作中,作者不是把自己放在不容置疑的权威位置,而是可信赖的、有说服力的角色。在具有反思性质的写作中,作者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具体写作能力,是否具有敏感性和参与性,即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对象之间是否有碰撞或联结。

国内的民族志写作、民俗志写作及历史人类学写作都属于文化写作,这是因为无论是民族志、民俗志还是历史人类学研究,都是实现中国“文化自觉”^[32]的途径,都离不开中国本土田野和历史文化传统^[33]。Tyler说:“我们都是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写作”^[34]。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5]。国内文化写作研究一方面推介总结西方民族志写作研究,并积极就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具体细节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批判西方文化写作,并开始探索中国本土文化书写路径^[36]。如吴宗杰等^[17]针对后现代人类学出现的表述困境,把民族志写作和话语批判结合起来,探讨《史记》中的叙事范式,既探索适合中国本土文化原生态的文化写作方式,也要在西方话语占统治地位的当下发出中国声音,发展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志话语分析的新思路。吴宗杰等^[37]从民族志书写角度研究《史记》中的文化书写。《史记》经常被当作古籍封存在过去,作者从西方的民族志写作研究视角出发,从文献互征、文化与事实的边界、行事叙述与价值论断、成一家之言、文化之间的“参彼己”5个方面探讨其中的文化写作,目的是跳出西方阐释文化的话语框架,探索符合中国当下独特的社会实践和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书写方式,发出中国声音。作者用话语的视角对《史记》文本做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得出5个观点:第一,中国的文化书写既要注重过去的文字历史,也要重视当下独特的“中国经验”;第二,中国的文化书写要追求意义的真实性和文本(包括口语)的实证性,打破文化与科学、事实与想象的界线;第三,中国的文化书写具有教化的功能,在行事的刻画中彰显大义,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不是宏大的议论或说教,而是负载于细节描写中;第四,中国的文化书写可包容古今中外的不同声音,贯穿其中的是远古而来的文脉,道冠古今,从而形成中国独有的一家之言;第五,中国的文化书写要让自己投入对自身和他者文化的理解,促进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和谐共处,通过“参彼己”形成国际话语平台,使一切冲突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可以在文化写作中化解^[37]。

4 民族志如何书写

尽管《写文化》强调文本化过程和人类学实践,但是,显然在实际的民族志写作中,并没有多少革新性

尝试,对于新的民族志写作形式的探索目前来说还比较少,反而更加尊崇旧有的表征体裁,还保留“科学思维”的写作^[38]。反思性民族志并没有可供作范例的民族志写作文本^{[39]136}。即便如此,《写文化》之后的民族志写作研究在以下三方面思想达成一致:一是打破“科学思维”;二是运用语言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三是强调民族志的书写是作者、研究对象、爆料人之间权力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4.1 打破“科学思维”

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思维不同,民族志写作研究者认为,“科学思维”就是作者以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描述,告诉读者他认为的文化是什么,这样难免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他者文化,并不利于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科学思维的写作看似现实主义写作,力求真实、准确、客观、全面,实际并不能反映所研究文化的全貌。Tyler^{[39]137}对“科学思维”有独到的理解,她认为,“科学思维”的写作逻辑性强,任何观点的抛出都有论据支撑;然而,在作者自认为掌握足够证据阐明观点得出结论时,往往会掩盖其他存在的可能性。“科学思维”下的民族志虽然对研究对象具有一定认知,由于其论点—证据—结论的框架,实际上封闭了研究对象多元化的意义。“科学思维”下的民族志叙述越详细越丰富,被掩盖的亟需认知的就越多^{[39]123}。科学思维要求民族志写作能够自圆其说,即使所下的结论有失偏颇,但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民族志作者仍然可以掌控他的话语,构建全知全能的权威。科学思维的民族志写作寻求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需要依靠语言认知在观点上达成一致,借此形成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一旦形成,很难与其他不同的表征和叙述产生互动。

因此,科学思维方式受到反思民族志的强烈批判,后者赋予民族志写作更加跨学科的视角,使用权力与表征、文本性与文本化、声音与叙述等全新概念来重新看待民族志写作,重新描述他者,并在哲学和文学视角下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比如 Mahadevan^[40]认为,民族志既是研究范式,也是写作方式,这包括两种转型:第一,作者需要通过自身文化来理解他者文化;第二,把生活转成一种叙述。因此,民族志研究者要实践三方面的角色:一是要给读者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田野故事;二是民族志研究者需要承认,其所描述的田野都带有自身的主观性;三是如果研究者和田野不能够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那么民族志写作也可以成为可操作的反思路径,即如何通过分析权力节点和在不同层面的权力关系中找到新的意义。

4.2 叙述语言的使用

民族志写作虽然是记录田野、日常生活,但是所使用的语言又并不是完全的白话,诗性语言的作用就在于此,即激发人的道德感。但民族志写作并不是说教,而是具有唤醒的功能,因此,民族志写作也是艺术创作或者说文学写作^[41-42]。民族志写作的文学转向倡导的是一种对话而不是一定要形成某一权威性的叙述范式。用写小说的手法来写民族志成为许多民族志研究者实践的内容^[43]。运用讲故事的方法,比如有人物、情景、情节发展等因素,同时可以是时间性的顺序,或者是以故事进展为线索。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具有启示性,可以让读者沉浸于故事的讲述^[44]。Marcus 提出,民族志写作就是一种唤醒,“唤醒”就是通过构建想象的共同体或者集体记忆,激发读者和作者内在的道德感^[10]。比如 Fitzpatrick 基于对新西兰一所学校被边缘化了的年轻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描述了诗歌如何成为其研究的一部分^[45]。诗歌既是民族志学者和研究对象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与当下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诗歌在民族志写作中的使用,有助于表现一些不确定性的、无法用语言言说的东西,帮助民族志学者表征其所经历的复杂情感历程。诗歌在民族志写作中将个体和政治联系起来,成为其批判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诗歌表现力丰富,能够激发想象和美感,在质性研究中是一种有效的表征方式。

4.3 民族志写作与权力关系

民族志写作是诗学的,其中的修辞、语言表达方式、写作风格可以各不相同;民族志的写作也是政治学的,文本与当时民族志作者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语境有关。民族志写作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构建,同时,民族志写作的过程是作者处理研究对象、爆料人等权力关系的过程^[46-47]。

民族志作者在田野调查和写作中的位置及研究对象,爆料人等之间的位置关系需要协商,不是一成

不变的,体现了民族志实践中的关系灵活性。民族志作者的位置,涉及构建人类学的“差异”,对民族志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灵活的勾画。民族志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位置、转变、交叉和协商,从理性和感性角度来说,充斥于整个构建他者的过程中^[48]。反思性民族志写作是把研究者、田野经历和读者之间的权力线路翻译加工的过程。这样,民族志意义的产生就依赖于研究者、田野和读者的三角权力关系、实践原则及支配结构。而且,民族志写作还会受到文本之外的一些影响^[43]。

Van Buren^[48]认为,在民族志写作中作者具有双重代理角色,一种是在写作过程中,民族志写作者如何处理关键爆料人的关系(即为何使用某个人的口述材料,而非其他人的),民族志写作是写作者和爆料人之间的一种妥协或合作。在阅读过程中,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如何互动?这也涉及作者和读者之间互相理解的问题和跨文化写作的问题。总之,在写作过程中,民族志写作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这与写作者本身的经历、素养等有直接关系。

Goldstein^[49]的研究表明,研究对象不是被动地、静止地被研究和写作,而是主动地、积极地在整个研究实践中起作用。研究对象在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的时候,不仅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材料,也希望能够借此方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文化身份,从而影响自身的实际生活。在民族志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在选择用谁的视角来写作的时候,可能会不得不选择某些声音,比如他们的朋友,或者是重要的爆料人,而忽视其他声音。

5 结 语

《写文化》是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再思考,西方民族志文化写作面对写作对象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及一种尊重他者的视角和态度。如今,这个态度似乎更加明显。西方民族志写作和中国民族志写作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建构,后者是建构自身文化以达到理解自己的目的。前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理解他者文化,以便与他者文化和平对话;后者的目的是要理解自身文化,以便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

对《写文化》出版之后的民族志写作研究作四方面的梳理,旨在为中国民族志写作前景提供重要启示。对于中国民族志的写作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历史和历史文献与当下民族志田野之间的关系^[50-51]。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字积淀的民族,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因此,要关注历史,重视历史学和民族志结合非常重要^[52-54]。

如何继续深入挖掘中国过去的书写传统,结合西方后《写文化》时期的民族志写作研究,立足于当下中国田野,探索中国本土的民族志书写实践,如何延续民族志书写中的教化传统,这或许是中国民族志写作研究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CLIFFORD J, MARCUS G E.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2] EMERSON R M, FRETZ R I, SHAW L L.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10.
- [3] JORDAN S A. Writing the other, writing the self: 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through ethnographic writing[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1, 1(1): 40.
- [4] MUTMAN M. Writing culture: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y[J].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6, 6(2): 153.
- [5] 高丙中.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J]. 思想战线, 2005(1): 75.
- [6] FISCHER M M J. Emergent forms of life: anthropologies of late or postmodernities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9, 28(1): 455.
- [7] CRAPANZANO V. Capturing emergent forms[J]. Anthropolos, 2005, 100(1): 229.
- [8] LANDIS D, KALIEVA R, ABITOVA S, et al. Thinking through ethnographic reading and writing [J]. Thinking

- Classroom, 2005, 6(1):5.
- [9] BRODKEY L. Writing ethnographic narratives[J]. Written Communication, 1987, 4(1): 25.
- [10] MARCUS G E. The legacies of writing culture and the near future of the ethnographic form: a sketch [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12, 27(3): 427.
- [11] 卢崴翔. 以安顿生命为目标的研究方法: 卡洛琳·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J]. 社会学研究, 2014(6):221.
- [12] WHITAKER M P. Ethnography as learning: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writing ethnographic accounts[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96, 69(1): 1-13.
- [13] BEACH D. The deceptive imagination and ethnographic writing[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2002 (6):167.
- [14] DENZIN N. Aesthetics and the practic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0, 6(2):278.
- [15] TEDLOK B. Ethnography and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M] // DENZIN N, LINCOLN Y.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2000: 455-486.
- [16] MARCUS G E.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 // CLIFFORD J, MARCUS G E.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168.
- [17] 吴宗杰, 余华.《史记》叙事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71.
- [18] DECASTELL S, WAALKER T. Identity, metamorphosis,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what “kind” of story if “ways with words”? [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991, 22(1): 3.
- [19] MARCUS G E, FISCHER M J.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12.
- [20] BRODKEY L. Writing critical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987, 18(2): 67.
- [21] EGAN K, MURPHY F. The value of ethnographic writing[J]. Anthropology Today, 2010, 26(6): 28.
- [22] CHILDRESS H. Kinder ethnographic writing[J]. Qualitative Inquiry, 1998,4(2): 249.
- [23] STAHL A, MANN R, LOREN D D. Writing for many: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practices of writing [J].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004, 38(2): 83.
- [24] MARCUS G E, CUSHMAN D. Ethnographies as texts[J]. Annual Reviews,2003, 11(6): 25.
- [25] REED-DANAHAY D. Turning points and textual strategie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002, 15(4): 421.
- [26] 徐新建. 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94.
- [27] NEWMAHR S. Becoming a sadomasochist: integrating self and other in ethnographic analysi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08,37(5):619.
- [28] ELLIS C, ADAMS T E, BOCHNER A P.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11, 36 (4): 273.
- [29] ADAMS T E. Seeking father: relationally reframing a troubled love story [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6, 12(4): 704.
- [30] ELLIS C. “There are survivors”: telling a story of a sudden death[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3, 34(4):711.
- [31] HAZAN H. The ethnographer’s textual presence: on three forms of anthropological authorship[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5, 10(3): 395.
- [32] 高丙中.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J]. 思想战线, 2005,31(5):42.
- [33] 刘朝晖.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J]. 民族研究,2005(3):94.
- [34] TYLER S A. Review on localizing strategies: 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by richard fardon [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4, 21(3):630.
- [35]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OL]. (2014-10-15)[2015-09-0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1116825558.htm>.

- [36] 刘朝晖.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人类学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3):29.
- [37] 吴宗杰, 张崇. 从《史记》的文化书写探讨“中国故事”的讲述[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5):5.
- [38] STANTON G. Writing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4, 7(2): 155.
- [39] TYLER S A.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M] // CLIFFORD J, MARCUS G E.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40] MAHADEVAN J. Translating nodes of power through reflexive ethnographic writing[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 2012, 1(1): 119.
- [41] 王倩.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J]. 世界民族, 2011(5): 39.
- [42] 朱炳祥.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J]. 民族研究, 2011(3):12.
- [43] FRANK K. “The Management of Hunger”: using fiction in writing anthropology[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0 (6): 474.
- [44] ELLIS C, ELLISON L. Qualitative Methods [M] // BORGATTA E, MONTGOMERY R.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2000: 2287-2296.
- [45] FITZPATRICK K.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poetry, self,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J].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012, 12(1): 8.
- [46] ENQUIX B. Negotiating the field: rethinking ethnographic authority, experience and the frontiers of research[J]. Qualitative Research, 2014, 14(1):79.
- [47] 刘朝晖. 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7.
- [48] VAN BUREN T. Reflections on writing culture[J]. Voices, 2006, 32(1/2):18.
- [49] GOLDSTEIN D M. Desconfianza and problems of representation in urban ethnography [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002, 75(3):485.
- [50]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5:197.
- [51] EVANS-PRITCHARD E 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M] // EVANS-PRITCHARD E E.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64.
- [52] FREEDMAN M.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 14(1): 1.
- [53] 徐杰舜, 张应强.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八[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8): 39.
- [54] 赵世瑜. 反思“写文化时代”中的志书写作[J]. 节日研究, 2014(1):34.